

九  
年  
十  
月

#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 著

中 华 书 局

1985年·北京

---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 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0 1/4印张·469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241 定价：3.60元

## 序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在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接到王庆成同志来信，问我们编纂的资料目录已经公布了两年，何以至今未见出版。从来信中，知道他是一位在中央理论部门工作的青年，爱好太平天国史。我回信告诉他，经中国史学会决定，应先出太平天国本身文献，反面资料暂时不宜刊出，所以未印。后来我接到通知，从中知道了王庆成同志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向有关方面反映，中国史学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平天国反面资料仍可刊行。那时候，王庆成同志以一个青年人对国家科学研究事业就如此关心，使我开始认识他，敬重他。

一九五七年我在北京医病，他来看我，和我讨论太平天国史。我从交谈中，看出他曾对太平天国史下过功夫。我感到一个青年人能够以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坚持不懈，是十分可贵的，向他表示了我的钦敬。一九五九年，他调《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工作，因业务关系，常有联系。到一九七七年，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同在一个单位，更时相切磋。他做过理论工作，做过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间还做过文物工作，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先后在资料编辑室、政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但这些工作，不曾妨碍他的研究太平天国史，反而有利于他从纵深方面发展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我认识王庆成同志二十七年了，他是我认识的同志里第一个以业余研究而很有成就的太平天国史专家，这正是因为他能够较好地、把理论锻炼、业务锻炼和研究锻炼结合起来

的结果。

古人说，“文如其人”。同样也可以说，“研究如其人”。王庆成同志是个心细思精的人。他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了这个长处。我国古代经师在学术上各有自己的贡献，但他们一般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看不见泰山。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王庆成同志有细微的功夫，又在理论锻炼上有一定的修养，因而他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如本书《圣神风、圣神电及其他》一篇，他抓着“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研究，丝丝入扣地指出了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便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

现在，王庆成同志把他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编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我学习后，感到了下列几个特点：

(一)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关于金田起义的事实和过程、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关于太平军的编制制度、关于儒家墨家同太平天国上帝的关系等等，本书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据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体会，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过程，只有不断深入，才能使太平天国研究真正兴旺发达，不断发展。本书提出的许多新看法，虽然不一定都为大家所同意，但对推动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看法，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并已产生了影响。

(二)开阔了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宗教，本书有十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扩大了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研

究的范围。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我在三十年代就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后来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确定它的农民革命性质，并不是要否认太平天国宗教的存在，而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它的实质和作用。近年来，王庆成同志经常提出要开阔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以深入认识历史，本书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可说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之一。还可以提出的是，他不是单纯地就宗教谈宗教，而是力图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分析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这也是他的研究方法的一个特色。

(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历史研究。研究历史必须首先搞清事实。本书有一些文章是对史实的稽考，还有一些论文也包含了考订史事的内容，这说明了王庆成同志对澄清史事的重视。但通观全书，许多研究课题都贯串着重视理论分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即使在对史事的稽考中，也较多地注意于事物间的联系。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就的基本原因。王庆成同志近年来注意于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经验，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对于太平天国研究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些见解和他在研究工作中发挥理论思维作用的经验，都是值得重视的。

上面这三个特点，是我学习后的感受。庆成同志要我做篇序文，序文我是不敢当的。我谨把我对他的一些认识，和我学习他的大著后的观感写了出来，以供同志们读本书时作一点参考。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 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 目 录

序.....	罗尔纲
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 1 )
“拜上帝会”释论.....	( 43 )
金田起义记——关于它的准备、实现和日期诸问题.....	( 65 )
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	(164)
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	(193)
《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217)
太平天国的“旗制”.....	(242)
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275)
太平天国的“天”和上帝.....	(289)
太平天国对上帝的称谓及其来源.....	(294)
太平天国的一神论——一帝论.....	(300)
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和赏善罚恶.....	(309)
太平天国的“魔鬼”.....	(320)
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	(338)
“太平玉玺”的读法.....	(352)
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363)
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	(373)
后期太平天国铨政紊乱的原因.....	(402)

---

壬戌十二年石达开的招兵告示和行军活动·····	(409)
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	(421)
太平军和捻军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451)
太平天国的传说和历史·····	(469)
关于洪秀全族谱·····	(487)
访问金田、紫荆·····	(500)
“王四殿下”不是杨秀清·····	(524)
《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	(529)
辨石达开“伪造”密诏·····	(534)
释“妄为推测有何益”·····	(537)
“嗣君”及其他·····	(541)
洪仁玕绝命诗·····	(546)
李秀成评价和忠王府存废·····	(551)
《镇江见闻录》别本中的新史料·····	(555)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557)
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	(559)
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点认识·····	(585)
怎样认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 ——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	(588)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	(611)
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615)
后记·····	(643)
后记之后·····	(644)



## 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洪秀全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早期思想,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性质、面貌,有很密切的关系。三十年来,前辈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国近代史》等重要著作中,以及其他研究者在各种论著中,都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他发起太平天国革命的历程有所分析论述,达到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形成了一些惯常的看法。他们的成果,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奠定了一个基础。本文就是试图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洪秀全究在何时和怎样转变到立志进行反清革命斗争?基督教对他的早期思想起了什么影响?是否只是借用了“上帝”这个名词来发动革命?他的早期著作是否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等等。简言之,就是试图对洪秀全在发动金田起义以前的思想基础作一研究。

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不容易的。客观上,它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主观上,研究者除了认识能力有高下之外,视野还不免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一个过程。本文对洪秀全早期思想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希望能对这种认识过程的前进有所助益。

### (一) 1843年以前的洪秀全及其思想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sup>①</sup>出生

<sup>①</sup> 许多历史资料都用阴历纪时,而且往往纪月而不纪日,如勉强以公历推算,反

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据同他“巷里相接”的族弟洪仁玕的忆述：“童年的洪秀全学习能力发展很特出，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他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五经、古文和孝经；后来他自读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一些较奇特的书。所有这些，他初读以后，即能了解。”<sup>②</sup>由于他的学业优良，家庭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很快，他得到了老师和亲属的喜爱，他们以他的才学而骄傲，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皇帝就是从翰林院选拔高级官员的，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sup>③</sup>

大约从十六岁以后直到三十一岁，即从1828年至1843年的十五年间，洪秀全的经历主要是两项：应科举，做塾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人的寻常经历。

在这十几年间，洪秀全应科举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不很充分。据洪仁玕忆述：

洪秀全的家庭对他的文才抱有很高的期待。在早年，约在仅有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带着实现这种期待的希望，开始参加在广州的考试。

县考时，秀全的名字在榜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从未能得中秀才<sup>④</sup>。

按照清朝的制度，童生考秀才，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县

---

不准确。为区别起见，本书凡以汉字标年月日者，指阴历；凡以阿拉伯数字标年月日者，均指公历。嘉庆十八年相当于公元1813年。所以用公元来计算洪秀全虚龄时，都以1813年起算。

②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据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重印的1854年英文原本《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校改了译文。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据英文本校改了译文。

④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本校改了译文。

考要试五场，第一场被录取，即有府试的资格；但只有终场时的第一名才称为“案首”，“院试时相沿取以入学”<sup>①</sup>。洪秀全十六岁那年应试，县考虽“名列前茅”，但看来并不是“案首”，这一年的府试或院试，他失败了。

洪秀全十六岁应试不中，即在家参加辅助劳动，不久受聘为塾师。其后，又有继续应试之记录：

1836年，秀全二十三岁时，他再次去广州应试。

下一年，1837年，他再次去省城应考。开始时，其名宇在榜的前列，但后来又在榜的后列<sup>②</sup>。

落第的童生再次应考，每次都要从第一级考试县考做起<sup>③</sup>。洪秀全这两次去省城前，必然又经历了县一级考试的磨炼。在府试中，第一场录取就可以应院试。院试主要是两场，一正试一复试。这里说洪秀全开始时名在前列，后来又在后列而落第，看来是院试未能通过。

在1837年这次落第后，洪秀全连续卧病四十多天。病后，“此时他仍再赴广州应试，并跟过去一样，在距本乡八哩的一所学校里任教师数年。”<sup>④</sup>洪仁玕在后来的“自述”中曾概述洪秀全应考之事说：洪秀全“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洪秀全三十一岁，正是1843年，这是洪秀全的最后一次应试<sup>⑤</sup>。

① 商衍盛：《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第5页。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本校改了译文。

③ 只有经院试取为廪生者（略相当于备取生），下次应试可免府、县两级考试而径直参加院试。参考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1931）。

④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节。据英文本校改了译文。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847页。道试即院试，清代各省学政原称学道。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哪一年，另有不同的说法。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中说，洪秀全在1847年

这些记录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以前曾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洪仁玕明确提到洪秀全去广州应府、院考试的就有四次<sup>⑥</sup>,而在每次去广州以前,他又须先在花县应考。人们知道,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社会中下层的少数知识分子得以跻入统治者的行列,因而众多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被这一制度所牢笼。洪秀全多次参加了这种考试,这一基本的经历,表明了这段时期中的洪秀全不可能有推翻清朝、矢志革命的思想。

然而,也有历史资料记载着洪秀全1837年广州应考落第回家途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sup>⑦</sup>。

还说洪秀全在这次回家以后病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第三次府试落榜后去拜访罗孝全(该书第十四章)。经查 G.H. McNeur:《China's First Preacher Liang-Fa》原书,“第三次”应作“又一次”。又,萧一山《清代通史》引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洪仁玕另一份供词,中有洪秀全“考到三十四五岁”之句,洪秀全三十五岁为1847年。据此,洪秀全似于1847年春又一次应考。但洪秀全1847年春去广州系应召去罗孝全处学道,洪仁玕陪同前往,洪仁玕在1852年向韩山文的述辞完全没有提到此次去广州有应考之事。本文从1843年为最后一次应考之说。

⑥ 洪仁玕的这些叙述,也有值得进一步推究之处,如据清朝定制,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1836年为丙申年,是科考年,而1837年丁酉,并非岁考年。因而有人认为不存在洪秀全1837年去广州应考之事。但实际上是有例外情况的。如遇有“恩科”时,就会以岁考作科考,乡试后再举行一次科考。所以广州在丁酉年有一次童试,并非不可能之事。国外有学者在论说洪秀全不可能1836、1837两年接连去广州应考时说,这“显违三年一次定例”。案此实有误解。三年一次是乡试,童生考秀才是三年两次。

⑦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848页。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sup>①</sup>。

这些诗句，充满了对于清朝统治的反抗情绪和洪秀全胸怀大志、要成就帝王之业的抱负。它们往往被认为洪秀全产生反清革命思想的起始。

但是，如果我们正视洪秀全本人的上述实际经历，对于资料中的这种记载和据以作出的论断，不能不提出怀疑。

研究洪秀全的这些诗句，首先必须注意它们的来源和被宣布时的环境。人们知道，洪秀全在1837年落第回家的病中有过种种异象异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假装的<sup>②</sup>。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当洪秀全后来立志发动革命以后，在太平天国立国以后，对于这次卧病和病中所见异象的记述，就有了许多附加的成份，大大地夸大了它的事实和意义。关于洪秀全在1837年病前和病中的上述两首诗，其真实性极可能受了后来突出神化洪秀全的异梦异象这种政治作用的影响。事实上，被认为属于洪秀全早期的某些言论、思想，由于后来的政治作用的需要而被改动、增添，以致脱离事实真相、前后互有矛盾的事例，是不在少数的。例如，洪仁玕在1852年的记述说，洪秀全在1845—1846年时曾得奇梦，梦见红日在其手中，醒后乃作“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燄火敢争光”等八句诗<sup>③</sup>。这个梦和这首诗的政治作用是显然的。根据下面要研究的洪秀全在1845—1846年的基本思想，他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写这样的诗，洪仁玕1852年的这段记述已很不可信。然而不仅如此，洪仁玕后来在1861年所著《英杰归真》一书中又进一步把此诗的写

---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

② 如果说洪秀全在1837年已有意装病以宣传符瑞受命一套，那也不能解释此后为什么还去考清朝的秀才。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

作时间提前到1843年洪秀全未拜上帝之时，并将首句“五百年临真日出”改为“天下太平真日出”<sup>①</sup>。这当然更不可信。又如，《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都说洪秀全1837年卧病凡四十余日，“自三月初一日升天，至送下凡时约四十余日”。但《英杰归真》却说三月初四日鸟语喧哗、阴雨放晴，洪秀全吟“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霍然病愈；而另一种太平天国的官书《王长次兄亲眼亲耳共证福音书》又是别一种说法：洪秀全三月初一子时升天，越两日下凡，复于初三、四升天大战妖魔。这些升天、下凡的神话暂且不论，但所谓洪秀全在三月初四写“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却由此可见破绽，实为子虚乌有之事。这篇《王长次兄亲眼亲耳共证福音书》还记录了洪秀全1837年病中所唱的《十全大吉诗》十首。诗有许多隐语，至今我们还不能全部解释，但其中包括叫人民敬信上帝、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姑不论一个人在狂病中能否清楚地念出十首诗而被别人听得明白、记得确切，就是以诗的内容来说，这时洪秀全还没有接触基督教，还没有“看明天书”，怎么可能教人去信仰上帝？所谓1837年唱这十首诗，分明也是后来的编造。

这些事例说明，历史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涉及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材料时，应该十分谨慎。对于前述所谓洪秀全在1837年就写了那两首“龙潜”诗、“斩邪留正”诗的说法，也应作如是观。诚然，对于一个熟读经史、热切于功名的人来说，屡试不售的打击是巨大的<sup>②</sup>，发出不平之鸣以至某种愤激之声是可能的。洪秀全如果当时

<sup>①</sup> 《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573页。“五百年临真日出”，有继承朱元璋事业之意，改字后就完全掩盖了这一点。

<sup>②</sup> 屡试不售无疑在洪秀全以及洪仁玕身上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后来，洪秀全刚刚起义开国，在永安弹丸之地就举行考试，建都天京后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洪仁玕到天京的当年就举行“会试”等等，都可以看作补偿这种创伤的反映。

的确有过这类诗句，其内容和词句与今天所见的这些诗句也必然有所差异<sup>①</sup>。

洪秀全在1837年不可能形成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这不仅根据他在这段时期中的基本经历，而且也根据他这年病中的其他言行。就在洪仁玕说他写了“龙潜”诗回家后，他的病发作了，他以为死日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生命快完结了。父母呵，你们对我的爱，我的回报是多么糟呵！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显扬你们了！”<sup>②</sup>这番话表达了洪秀全对不能成就功名以光耀父母的惭愧和遗恨，哪里有同时写出“龙潜”诗等诗句的思想基础呢<sup>③</sup>？

---

① 洪秀全在1837年病中作“斩邪留正”诗一事，见于《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人们说，《太平天国起义记》是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在1852年的叙述和材料写成的，此时洪仁玕在香港，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他只是客观地转述他昔年亲耳听到的洪秀全讲述异梦的经过，并无神化洪秀全之意，《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记是可靠的。这似乎忽略了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洪秀全1837年异梦的真正情况是一回事，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为了发动起义的需要发展夸张了异梦的情节又是一回事。如下文将要讨论的，洪秀全在1848年冬“诏明”《太平天日》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大不同于1837年的异梦了。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这时都在花县，经常见面商谈有半年之久。如果强调洪仁玕只是“客观”转述，不会“神化”洪秀全，那末，这个客观中必已包括了洪秀全的“主观”。至于说这首诗至迟在1854年已有流传，这与所讨论的1837年是否有这首诗并无关系。如果说有关，那倒是恰恰否定了这首诗是1837年病中所作，因为传抄者注说，这是“真主”洪秀全在花县水口庙题壁的律诗（见萧一山《太平天国诏谕》）。总之，《太平天国起义记》是重要史料，研究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必须充分利用它；但重要史料、第一手史料所记并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实，并不一定都可靠，否则，我们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本校改了译文。

③ 洪仁玕《自述》说“龙潜”诗是洪秀全1837年落第回家在船中所作。但他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曾提到洪秀全此次落第是雇轿回家。有人认为这与在舟吟诗之说有矛盾，因而把“龙潜”诗的写作时间放在1843年落第时。其实，就研究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龙潜”诗的写作时间即使推迟至1843年，也是与这段时期洪秀全的基本思想基本活动有矛盾的。这样字句的“龙潜”诗，很可能是出现于洪秀全做了天下真主以后以说明其“潜龙”时期志向的。

## (二) 开始拜上帝并非开始搞革命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

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最初接触,曾有研究者强调郭士立的作用。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1831年来华,曾参与英国侵华活动。南京条约后,1844年,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宗教团体,名叫“汉会”,利用“汉会”成员深入内地传教,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sup>①</sup>。到1850年,郭士立的“汉会”所散发的圣经已遍及除甘肃以外的中国所有各省<sup>②</sup>。由于郭士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广泛的活动,关于郭士立同洪秀全、冯云山等关系,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就有许多传闻。如罗孝全在1852年的一篇报导中提到,“有人谓郭士笠先生的一位信徒已投入军中,但吾未想到此即洪秀全氏,更不以为其人已为革命领袖。”<sup>③</sup>英国公使文翰1853年春访问天京后的报告中说,太平天国“所习者确系故郭士笠博士之团体所印行之传道小册子”<sup>④</sup>。近人有著作甚至说,洪秀全曾从郭士立学道,正式加入基督教<sup>⑤</sup>;冯云山可能曾从郭士立受洗<sup>⑥</sup>。应该说,关于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本人同郭士立的这种关系,是缺乏可靠根据的。郭士立的“汉会”成员或他们的联系者后来有参加“拜上帝会”的,郭士立译的圣经和写的传道书后来也有传入

① E. P.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52),43页。

②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929),253页。

③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824页。

④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896页。

⑤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948),165页。

⑥ P. Clarke: «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1973)。



太平天国的，这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关系，他接触最早、早期思想所受影响最大的，可以确定，并不是郭士立或郭士立的作品，而是梁发的《劝世良言》。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9）生，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做雕板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译的圣经，后来受洗入教，被立为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新旧教派都力图更深地进入中国。一些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主观动机可能各各不同，客观上却总是配合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的。梁发同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在英国侵略者大量输入鸦片的时期，曾写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sup>①</sup>从宗教信仰上说，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的残余，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诚挚地迷信基督教的虚幻说教，也可以说他是受毒害的误入歧途者<sup>②</sup>。

《劝世良言》是梁发所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包括九种小册子，但也有分为四卷、三卷者。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旧约》圣经，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联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是

① 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1931），97页。

② 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多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